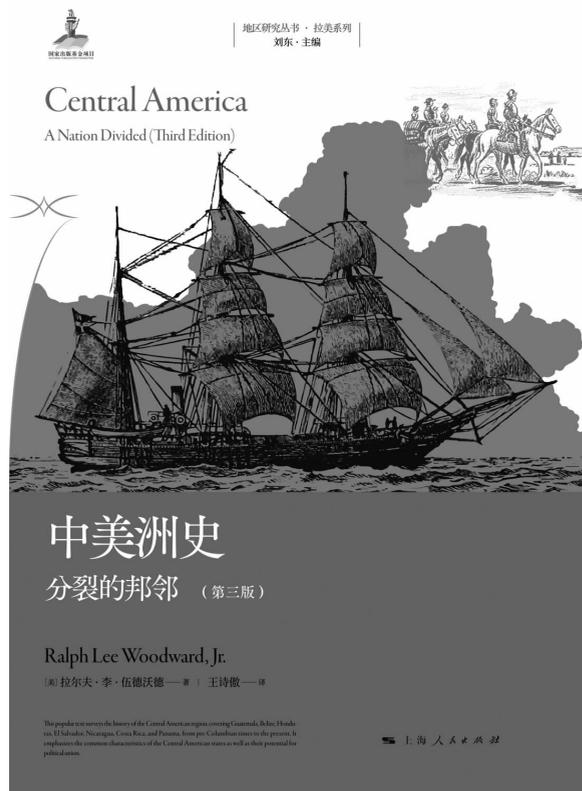


一战前后美国对中美洲的影响



《中美洲史：分裂的邦邻（第三版）》
[美]拉尔夫·李·伍德沃德 著 王诗傲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3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中美洲的投资和活动迅速增加。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德国和英国的竞争。在20世纪20年代，受外国控制的新寡头们作为保守派核心巩固了自身地位。192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对这些寡头造成沉重的打击，面对这种局面，除哥斯达黎加以外的所有中美洲国家都建立起强硬的独裁政权以此重建“秩序与进步”，同时遏制工人阶级日益高涨的改革要求。乌维科(Ubico)政府、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政府、卡里亚斯政府和索摩查政府重申了他们对外国资本的忠心，他们对从危地马拉到尼加拉瓜的整个地峡地区都实施铁腕统治。

与外国人的密切关系对中美洲造成了多样的影响。中美洲各国完成了自由派革命，摧毁了西班牙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残余，却建立了一种由外国主导的寡头政治，这使大多数民众仍需面临以前遭受过的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如果外国雇佣兵或冒险家在自己的国家播种革命和腐败，他们会受到惩罚，但在中美洲国家他们却被鼓励这样做。这些行为导致本地人对德国和北美外国佬(gringo)的仇恨与日俱增。虽然外国公司早就不可能在自己国家使用粗暴的达尔文适者生存理论，现在却以此为论据为自己的无良商业行为进行辩护。虽然在事实上这些公司推动了发展，但相应的好处却主要流向了外国人。即使是从中获利的当地人也把钱存到国外，如新奥尔良、纽约、日内瓦、伦敦等地。

随着私人商业利益将北美的经济控制权延伸到中美洲，美国政府也在加勒比地区扩大了军事和外交势力，从而为商业扩张提供支持。这种结果究竟是“金元外交”的直接产物还是与战略防务利益的暗和，长期以来对此一直存在争议。但无论如何，军事干预和外交压力伴随着经济扩张，确保美国霸权取代英国的统治地位。由于英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利益有所扩大，而且德国和法国正与之竞争，加上英国参与布尔战争，以及出于与美国建立更密切关系的战略需要，这些因素共同促使英国面对北美的扩张时选择在中美洲地区采取更温和的姿态。1895年，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对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British Guiana)的边界纠纷进行了外交干预，这个事件经常被视为英国将其在加勒比地区的势力范围移交给美国的节点。在一年前，美国已经强烈抗议英国对莫斯奇多海岸的干预，这确保了英国从那里撤军。1895年，英国封锁了科林托，这是在中美洲实施炮舰外交所做出的最后一次努力。在美国的推动下达成了和解，作为交换条件，尼加拉瓜在向英国支付赔偿金后最终获得了英国对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认。此后不久，克利夫兰指派前南部邦联将领爱德华·波特·亚历山大对尼加拉瓜与哥斯达黎加边

界纠纷进行公断，自此拉开了美国政府深入介入中美洲内政的序幕。

后来美国涉入了古巴独立战争，这使得美国官方对加勒比地区的兴趣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一次干预行动直接导致美国取得了波多黎各、一个古巴的海军基地和一个太平洋岛屿国。随着将海军力量从一个大洋转移到另一个大洋的战略必要性彰显，美国重新燃起了对地峡运河的兴趣。横贯大陆的铁路建成后，北美对运河的支持减弱了，但这种兴趣从未完全消失。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在1878年哥伦比亚政府将在巴拿马的权利让给一家法国公司之后，关于通洋运河的讨论重新被提起。在费迪南·德·雷赛布的指导下，环球跨洋公司于1882年开始开凿。与此同时，华盛顿与尼加拉瓜签订了一项新条约以获取在尼加拉瓜修建一条运河的权利。1884年12月，美国参议院否决了该条约。1887年，尼加拉瓜政府将权利让与尼加拉瓜运河协会，该协会发起测量并于1889年推动在美国创建海事运河公司负责监督施工。协会把设备带到格雷敦，开始在那里疏浚，但由于19世纪90年代的世界经济萧条，资金逐渐耗尽。如同法国人在巴拿马了解到的情况，大量特殊的工程要求为建造带来障碍，耗费巨大，而且黄热病也同样难以对付。到1895年，尼加拉瓜的建设活动差不多都停止了。法国公司在该项目上花费了2.6亿美元，随后于1889年破产。该公司的总工程师菲利普·比诺·巴里利亚返回法国后组建了一个新企业，但他的新巴拿马运河公司无法吸引到施工所需的资金。

随着美国对加勒比地区兴趣的恢复，比诺·巴里利亚有机会通过向美国出售法国手中的特许权来弥补损失。美国海军大力支持重建运河项目。从1894年起，海军部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就开始主张重新开启在尼加拉瓜的活动。在将兴趣焦点转移到巴拿马的过程中，比诺·巴里利亚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海军上将约翰·G.沃克领导的一个国会委员会对中美洲运河路线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彻底的勘察之后，给出的意见是尼加拉瓜运河路线可行。然而，以比诺·巴里利亚和纽约律师威廉·N. 克伦威尔为首的法国利益集团疯狂地劝说国会批准巴拿马航线及获取法国手中的特许权。与此同时，与英国签署的第二份《海-庞斯富特条约》取消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关于防御工事的禁令，为美国控制运河扫清了障碍。尼加拉瓜政府对美国可能在那里修建的跨洋运河的主权和控制权提出了明确要求，这导致巴拿马航线对美国的吸引力变得更大。最后，1901年就任的罗斯福总统说服沃克委员会将建议地点改为巴拿马。早在1902年3月，国会还未通过《斯普纳法案》时，美国与哥伦比亚之间的谈判就开始了。这项法案授权总统以高达4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新巴拿马运河公司的特许权和名下资产。

根据《比德拉克条约》的规定，巴拿马铁路将于1855年修建完工，此后美国在巴拿马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与哥伦比亚的其他地区相比，巴拿马的地理位置较为偏僻，这使得政府管理松懈，而且导致整个地峡的自治程度也存在差异。从西班牙独立后不久便有人试图将巴拿马独立出来，但这些尝试都失败了。不过，在1840年至1841年间巴拿马享受到了为期13个月的短暂独立，并在1853年至1863年间依联邦宪法进行自治。后来，直到1885年哥伦比亚总统拉斐尔·努涅斯重新建立起中央集权政权，地峡几乎一直处于自治状态。此后，波哥大的不稳定经常反映在巴拿马城的街道上，巴拿马和中美洲其他地区一样内乱频繁。在1885年以前，美国为了保护自身在铁路上的利益曾多次出兵巴拿马，而且每次都征得了巴拿马当局的同意。在哥伦比亚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之后，尽管发生了几起暴力事件，美国还是避免了直接干预。然而，受到哥伦比亚干日战争影响，1899年巴拿马发生了严重动乱起义。1902年9月，在未经任何哥伦比亚或巴拿马官员同意的情况下，美国军队登陆地峡，引发波哥大强烈抗议，导致美国和哥伦比亚关系陷入紧张。1903年1月，外交官们达成了运河协议《海-埃兰条约》，美国国会于三月批准了该条约，但哥伦比亚国会反对哥伦比亚放弃对运河地区的主权，而且对美国的干预表示愤怒，因此拒绝批准该协议。美国人威胁要继续推进尼加拉瓜航线，但哥伦比亚人仍然坚持反对。

此时，比诺·巴里利亚和克伦威尔与巴拿马政治家曼努埃尔·阿马多尔博士结盟，发动了一场叛变，这促使巴拿马在当年晚些时候独立。

说君子(88)

君子比德于菊。宋代思想家、文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中说道：“晋陶渊明独爱菊”，并认为“菊，花之隐逸者也”。因为陶渊明的渲染，菊一直被用来象征文人和君子的人格精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已然成为那些淡泊名利的君子所向往的生活方式。宋代诗人黄庭坚更是直接吟出“天寒花更香，岁晚弥芬芳，不与繁华竞，自知能洁白。君子当如菊”的诗句，从而使得“君子当如菊”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菊花有集长寿之花、隐逸之花、君子之花于一身之美名呢。

如果我们注意的话，被称为“花之君子”的“莲”，“花中君子”的梅兰竹菊都有一个共同的品性，那就是它们的“清淡”“素雅”“幽静”。除“竹”没有香味以外，其他诸花均有其“香”，但它们又都以非浓香而显其性，于是“暗香”“清香”“淡香”“幽香”就成为它们的共性所在。唯其非浓烈性，才以一个“清雅”来称谓之。“雅致”成为它们共同的属性和标志。而与此品性和德性相同的人就被称为“文人雅士”。

菊之清、淡、幽之雅表现在于它不与繁华为伍，不与群芳争艳。书法家钟会说菊“早植晚登，君子德也”。是说虽与众多花卉一同种植，菊花却无意与之争锋，大器“晚登”。百花斗艳乃至纷纷退场之后才姗姗而至，款款亮相，给人以谦让群芳之观感。君子比德于菊之谦让遂有谦谦君子之美德形象。以其终不为其美，故能成其美。于是我们才看到晋代诗人袁山松在《菊》诗中就赞美菊花“春露不染色，秋霜不改条”。唐代诗人元稹在《菊花》诗中更直谓“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菊花不会因为外境的改变而改变其自身的本性及其品格。春露也好，秋霜也好，皆不能移其性，变其形。菊花的这种品性成为君子精神和人格的象征。所谓人格的崇高正体现在行为的一致性之上呢！我们常以“矢志不渝”来形容君子的精神和人格。立誓决不改变自己的志向，无论外境发生怎样的变化和改变。这是一种“志于道”的理想性追求，这是一种“据于德”的毅力性磨炼，这是一种“由于义”的行动性展开。儒家所强调的“君子喻于义”正是反映着这种精神品质和人格魅力。

菊花的自显其性，自展其姿之品象征着君子的独善其身，自得其乐的精神与人格。文人、雅士、君子所崇尚的隐逸的生活方式是基于他们有一颗对世俗之名利的超越和淡漠之心。少私寡欲才能够得见和拥抱素朴之真。“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第19章），此之谓也。“君子当如菊”呼唤的正是这种绝尘超俗的素朴之境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与道家思想始终对历代文人和君子的精神和人格产生着深远影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的思想观念包含着君子的超世情怀与济世情怀，或说这是君子的两种精神人格。在穷困不得志的境遇下，要洁身自好，独自修养好自己的品德；而在显达得志的境遇下，要立志经世为民，使天下民众以及万物皆受惠益。经营世间，管理世务，济助世人，从而使天下“安平泰”，这是君子的济世情怀的表现。作为一名真正的君子不能没有这种“人世”情怀。说得通俗些，当君子身处显达之时不能够仅仅顾及自己的道德完善，而且要兼顾着自身以外的他人和社会，多做些利益人生和社会的事情。也就是说，积极投身于社会，为社会大众服务，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张载语），这些思想观念和价值观是构成君子在显达之时“兼济天下”的精神品质、道德准则和责任意识。这种积极的有为精神又集中体现在作为群众之首的《周易》之《易传》中的两段名言之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在人世中体现出来的，厚德载物的精神是在济世中体现出来的。而菊花的傲寒绽放正是象征着君子不畏艰难、不屈不挠的坚毅品格。

然而，人生总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说人生是常处于逆境之中的，不顺心不随意的事情是常伴左右的。如何面对人生的穷困之境，作为一个真正的君子一定要有不甘慕荣华，甘于平淡的胸襟，在心中保存着那一份隐退的心愿，并以此作为心灵的慰藉。你未必要有“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庄子语）的绝对远离官场的志向，但务必要有不终身为官而淡泊名志的向往。过着隐逸的生活，完全是为了保住自己那份做人的尊严。于是清静高洁就成为君子要坚守的品格。“晚登”，甚而“免登”那过于喧闹的官场，不参与影响心性的争斗，应该说是“君子比德于菊”最大的象征意义之所在。“早植晚登，君子德也”，此之谓也。“君子当如菊”，此之谓也。

内容简介

本书全景式地回顾了中美洲五国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的历史，重新思考了这一区域发展现状的根源。作者创新性地从“统一”视角出发，系统地描绘了中美洲五国从16世纪至20世纪末的历史变迁。类似的地理气候条件、共同的西班牙殖民历史、相近的文化语言传统等因素让中美洲五国具有走向联合的内在动力。

作者

拉尔夫·李·伍德沃德(1934—2022)

美国杜兰大学历史学系拉丁美洲历史荣休教授。于1962年获得杜兰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教于北卡罗来纳大学，是中美洲历史专家，整个学术生涯出版了多项个人专著，包括：《阶级特权与经济发展：危地马拉商委员会，1793—1871》《拉斐尔·卡雷拉与危地马拉共和国》《危地马拉简史》等。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127)